

革命年代

亲历者的
私人记录

下册

傅国涌
著

東方出版社

百年 辛亥

亲历者的
私人记录

下册

傅国涌
著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姚 恋
责任编辑：李 葳
封面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下册 / 傅国涌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60-4282-6

I. ①百… ①Ⅱ.傅… ①辛亥革命—研究 IV.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2351 号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BAI NIAN XINHAI: QINLIZHE DE SIREN JILU

傅国涌 著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174355

印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354 千字

印张：23.75

书号：ISBN 978-7-5060-4282-6

定价：42.80 元

引言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作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社会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集团、个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逼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做出的任何历史解释往往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在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了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裹着他们的心跳，那些可以触摸的细节，尤其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这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他们留下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社会的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衡、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麋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①

这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瓦解。清朝去势矣。最终冲垮清朝的乃是时也势也，而不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的变化，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的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最先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

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乱世的恐惧，渴望安全，渴望和平和秩序。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垮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导致对话成功，达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说：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②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本国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确切，1912年1月12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③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④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

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高度共识。正是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起伏不定的浪涛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乃至儿童，不仅有蒋介石、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赵景深、黄药眠……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他们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视角同样不可替代，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背影，他禁不住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靠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做判断。

傅国涌

2011年6月2日

【注释】

① 1912年1月17日，《恽毓鼎澄斋日记》(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1页。

② [法] 博里斯·马尔坦，张宇凌译：《是在中国，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岳麓书社2005年，第8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8页。

④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35页。

目 录

引 言	1
第五篇 朝廷内外	1
一、瑞澂弃城	1
二、石头城上	24
三、陆钟琦殉清	33
四、只有一个升允	45
五、荫昌的两个车头	53
六、王公大臣	58
七、退还是不退	75
第六篇 谁覆清廷?	96
一、学生	97
二、新军	125
三、立宪派	150
四、“哥老会的摇旗唤呐”	167

第七篇 财政困难	187
一、度支部：库空如洗	187
二、独立各省：纸币、勒索与募捐	210
三、南京临时政府：“急不择荫”	242
第八篇 创立民国	278
一、君宪还是共和？	278
二、退位诏书·隆裕太后	303
三、列强中立	323
四、改用阳历	329
五、民国襁褓	342
后 记	366

第五篇 朝廷内外

一、瑞澂弃城

失守疆臣首瑞澂，咸将澂字误称征。倘然不是休征验，翻戏何能一品膺。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

据湖广总督瑞澂的夫人廖克玉口述：1911年10月10日晚上兵变消息传进总督衙门时，瑞澂与张彪、张梅生等人商量。张梅生主张死守待援，“楚豫”舰管带陈德龙则说，到兵舰上照样可以指挥。此前，廖母已关照廖克玉，等到瑞澂进来时劝他快点逃走。她们母女是革命党的卧底。本来还在犹豫的瑞澂立即下令在后花园挖了个墙洞，爬过去后一家都上了“楚豫”舰。两三天后，瑞澂安排她们母女先搭长江轮到上海，住在哈同花园。隔了一段时间，瑞澂躲在外国轮船的大橱里逃到上海，辫子剪了，胡子剃了，人也憔悴不堪。她记得，当时有人编了一个京戏《鄂州血》，骂瑞澂听了老婆的话临阵脱逃，在大舞台上演。^①

几天后（10月14日），英国传教士计约翰的日记说，有两个外国人去了瑞澂逃跑后的总督衙门，看到一片狼藉。C.W. 林辅华记述：

……几处未遭火烧的地方，有些房间被撬去了地板，有些隔墙板被掀开了，这可以表明士兵们为抓获总督已搜遍了每一个角落。那里的所有房间内，书籍、图籍、信札、图样和各种陶器散乱一地，全是难以名状的残物堆。

客厅里，一套精致的欧式家具遭到严重破坏，壁炉挡板被扔在砸坏了的地板上，一辆送餐车被敲瘪了一侧。客厅里还有一张少了一组抽屉的漂亮书桌，抽屉是从桌子下部拉掉的。寝室内已被全部毁坏，除了一些碎砖外，只剩下一副已被炮火的高温扭成怪模怪样的西式铁床架。^②

瑞澂向北京和各省发出告急电，“省城兵与匪合，猛扑督署，其势甚锐，不得已暂登兵轮避锋”。此时，北京报纸还在登载这则消息：“瑞澂在武昌拿获革党，并有防患于未然之奏，廷旨嘉之，并令其择优褒奖。”^③



湖广总督瑞澂

10月12日，朝廷只是下旨将瑞澂革职，“仍署湖广总督，带罪图功”。其中内幕，据内阁阁丞华世奎对张国淦说是这样的：武昌兵变、瑞澂出逃的电到，庆亲王奕劻意在从严究办，即令查以前疆臣弃城处分成案，拟旨将瑞澂拿交法部治罪，镇国公载泽反对，改为革职戴罪图功，载泽与瑞澂是姻亲，“素来遇事袒护，庆邸无如之何”。^④

另有一说，庆亲王奏“封疆重臣，弃职逃去，岂可宽待？”隆裕太后说：“庚子那一年，咱们也不是逃走的吗？”庆亲王一时语塞，退而愤然说：“小舅子保驾！”指的就是载泽。瑞澂为载泽的姐夫，载泽为隆裕

的妹夫。^⑤

瑞澂弃城而走的消息在北京官场一传开，许多人表示不满。

10月12日，缪荃孙日记：“瑞澂以一身免，真庸才也。”^⑥

10月13日，许宝蘅当天入值，“见瑞澂电奏新军之变，全诿罪于张彪，并涉及张文襄。身任封疆，遇变仓皇走出，不思尽忠报国，犹复诿过人，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⑦

同日，恽毓鼎日记说：“瑞澂初六日（9月27日）即遣全眷回京，尽载贿而行。十三日（10月4日）闻有革党起事之信，移往楚豫兵轮。昼在署办事，夜宿舟中。十九日（10月10日）搜杀党人未毕，忽闻枪炮声，仓皇出城。藩臬以下官或遁或匿，无一守者，匪党坐而得之。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10月15日，“闻瑞澂出洋十二万元，求各国领事保险，德英两领事均鄙贱其人，不屑保，俄人保之。瑞为宣宗朝已故两广总督大学士琦善之孙，英吉利之陷广州，琦善实启之，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真所谓谬种流传矣。”^⑧

这些消息有真有假，可见京中传闻纷纷。

10月17日，翰林徐兆玮日记说：“自武昌出者，谓在城绝不知城之失守，及出城始知之。观此可知瑞督弃城之罪不可逃也。”^⑨

10月18日，翰林院侍讲学士罗文华的奏折说，革命党起事之说，相传已非一日，瑞澂闻之，即异常惊恐，自10月1日以后，“昼则入署办事，夜则避宿兵轮”。^⑩

10月20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写信给陆军部长：“人们说：怯懦的总督在受到攻击之前就离开了他的衙门；而张彪将军的迅速逃走，使得忠实于他的部队的防守瘫痪，从而使得应当仅仅是一次小冲突的事件变成了革命党的胜利。”^⑪

川粤铁路督办公所提调王孝绳目睹了瑞澂在“楚豫”舰上的不安。10月13日，瑞澂“异常急躁，因官幕已星散，不敷办公”。第二天，他想招几个人来办文案，也无人响应。^⑫

同一天，计约翰日记说：“瑞澂现在正郁郁不乐地坐在离江边不远的快艇内，朝廷已根本不会再起用他，人们也完全摒弃了他……”^⑬

在处置瑞澂的问题上，言官舆论汹汹，要将他明正典刑，最高决策层却犹豫不定。10月17日恽毓鼎日记说，“言官相继论瑞澂、张彪罪，请诛之，以申国纪。……瑞为泽公姊夫，袒甚力，恐国法不能及也。”^⑭

10月20日，胡石庵在汉口接到北京同志由上海转来的急电，“言清廷有旨，令各省官获到瑞澂、张彪，即行正法”。其实清廷此时压根没有下旨。^⑮

10月22日，恽毓鼎日记说：

阅报纸论瑞澂事，司道相率逃匿，有至京者，朝廷悉置不问，尚得谓有法纪乎？既无法纪，何以立国？悲愤填膺，手足俱冷。祖宗三百年缔造艰难之天下，以三年而尽弃之，岂能不哭？恨不呼列祖列宗，放声痛哭。……又旧制督抚同城而治，郭嵩焘、薛福成二公皆以为可裁并，余意亦深然其说。即今思之，湖北巡抚不裁，瑞澂虽逃，苟得一有胆力之汉巡抚，无难调遣标兵，居城定乱，何致一长官逃而阖城属员皆逃乎？益知祖制之不可轻动也。^⑯

同日，许宝衡日记说，“全台奏请将张彪、瑞澂正法，拟旨谕知，已派袁督查办，协理人对后，又将旨撤下，令台长明日预备召见，十二时散归。”^⑰

24日，恽毓鼎日记中对监国摄政王载沣不满：“金台联衔上疏请斩瑞澂，监国特召见三台长和解之。台臣之欲杀瑞澂，为国家宗社计也。监国之视宗社，当重且切于诸臣，乃力袒瑞澂，一若台臣之与瑞有私仇者，岂不异哉！”^⑱

同日，徐兆玮听说瑞澂已逃至九江，电奏以“楚豫”轮油米粮饷垂罄为由：“此等小人，真万死不足蔽辜矣！前日全台劾奏，昨特召见都察院三堂。监国谕已交袁世凯查办，以安台谏之心。未知亲贵更能为其援手否？”^⑲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有议员提案要求将瑞澂和张彪明正典刑。^⑳

10月26日，资政院的奏折指控瑞澂事先毫无防范，首先弃城逃船，导致武汉不守。

也是这一天，瑞澂在逃往上海时，发出一份致内阁请代奏电，称10月20日开轮下驶到九江，一面筹拨铜元4000串，以一半运交萨镇冰，一半运交张

彪。一面在九江买米 2000 石，正在装运间，九江于 10 月 23 日夜突然发生兵变，道署被抢，炮台被占，电局及招商码头被踞，并有以 20 万购瑞澂的传言。“楚豫”兵轮子弹无多，兵心涣散，甚不愿他在舰上，怕成为众矢之的。其余各舰也因九江兵变，纷纷开轮上驶，不听调遣。他无兵无将，无法可施，迫不得已，改坐商轮，到上海暂住。“以瑞澂衰病之身，一死诚何足惜；第念际此种族革命，以人之多寡为消长，在彼族方冀我族多死一人，即少一敌。且与其以身饲匪，上亵国威，何如伏阙请诛，借彰宪典。”^②

10 月 29 日，由许宝蘅起草的“拿问瑞澂上谕”下达：

该革督竟不遵旨带罪图功，乃敢潜逃出省，辜负朕恩，偷生丧耻，实堪痛恨，何能再予姑容。着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③

当天，恽毓鼎日记说：“瑞澂逃至上海，朝廷震怒，奉旨交张人骏拿解进京，交法部严讯治罪。人心稍快。”^④

第二天，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上海道刘燕翼：

瑞莘督奉旨拿解，已委员赴沪会拿，望不动声色，先行看管。至要。^⑤

早在 10 月 21 日，《民立报》转载过外文报纸的报道：“瑞澂已剪发剃须，易洋装，挈二十万金，将东渡扶桑。”

当年 11 月 6 日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说，瑞澂逃到上海时，沪道刘燕翼即安排廨员宝子观秘密看守，因他们之间有亲谊，任其自由，被潜逃日本。^⑥

10 月 31 日，樊芬从上海致电赵尔巽说，“旨着江督将瑞澂拿解来京。按瑞已赴日本。”^⑦

这些消息有误，瑞澂并没有逃到日本，而是一直躲在租界。^⑧

11 月 2 日，张人骏接到刘燕翼回电：

奉佳电，遵即亲自督同廉员宝令，驰赴瑞革督寓所察视，见工部局已派有探办多人在彼保护。据瑞革督面称，自知身为大臣，不应辜恩溺职，早当恭诣阙北请罪。惟现染病恙，拟医治少愈即力病起程，已径自电求宪台核示。至瑞革督寓居公共租[界]，在工部局警权范围之内，非华官所能看管……^②

11月8日，汉口日本领事馆情报有来自张彪的说法，“关于瑞澂之行踪，彼原在上海，想已于本月十四日[11月4日]到北京”。^③

可见连张彪也不知道瑞澂一直躲在上海。

当瑞澂逃到上海，熊希龄在东北写信给夫人朱其慧说：“莘帅举动出我意外。前月廿五以后，我曾两次电告，内有万一事不可为，乞思见危之义一语。次电则谓责备者多，愿公熟计。不知两电能否达到。然彼仓皇出走，竞至上海，实非所宜。”

11月1日，熊希龄给上海赵凤昌去电，“请劝莘帅自裁，免辱为要”。^④

另有一个满洲人志锜（瑾妃、珍妃的胞弟）素来主张维新，知革命得手，误于瑞澂，也从京师给赵凤昌来电，“传内意，请讽瑞自裁，以谢朝廷”。赵虽与瑞澂有来往，“惟以死节岂容人劝”，且正为革命的事忙得日不暇给，哪有时间为清廷传达使命，一笑置之。^⑤

曹汝霖回忆说，瑞澂在兵变后，“不知所措，性又怯懦，仓卒逃入兵舰，只顾性命，不能收拾时局”。^⑥

瑞澂在满人中并非庸才，也非保守派，他主张立宪，还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他反对将全国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海陆军经费，认为“新政各项均不可缓，惟有海陆军可缓”。谘议局联合会决议游说各省督抚，由张謇前往武昌找瑞澂，希望他发起督抚联奏，1910年10月25日、11月1日，十七省督抚两次联电要求摄政王明年开国会，瑞澂是其中活跃的，当时未参加的督抚只有赵尔丰、陈夔龙、张人骏、松寿、恩寿数人而已。^⑦

张謇在苏州惟盈旅馆替程德全起草的那份呼吁解散亲贵内阁、下罪己诏、实行宪政的电奏底稿有一段：

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范，何尝不密，临时之戒备，何尝不严，而皆变生仓卒，溃若决川。^④

10月30日，清廷所下罪己诏仍归罪于瑞澂：

湘鄂乱事，由于瑞澂之激变，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惟咎用瑞澂之不当，军民何罪。

即使瑞澂不逃，武昌一隅存有变数，但人心思变、天下瓦解之势已成，清朝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换一个人，不是瑞澂，表现未必有多大不同，甚至可能更糟。但他确实为各省疆臣不战而逃开了个头。

10月18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

绅士要求巡抚让位给革命党，不要抵抗，巡抚坚决拒绝。……

此地的商人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很放心，他们都同情革命，知道自己会得到保护。^⑤

10月22日，长沙易帜。余韶记得，他们进入巡抚衙门大堂时，巡抚余诚格正和卫队营讲话，一见他们到了，装作很镇静地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湖南都是好百姓，你们不要杀人。”随即用白布亲书“大汉”二字，叫人挂在桅杆上。

阎幼甫也回忆，预先拟定四位代表进入衙门，代表对余诚格说：“请抚台赞助革命。”余说：“我从不同你们为难，至于如何赞助革命，还得等我想一想。”随即命人拿出预备好的白布，亲书一“汉”字，命手下人悬挂在抚署前坪的桅杆上……他吩咐快预备点心，请代表用茶，他先告退……匆忙带着家眷在后墙打开一个窰口，逃往小西门外某洋行。^⑥

“汉”字旗到底是不是余诚格所写，其他亲历者有不同回忆。曾任湖南外交司长的粟戡时追记：当时，两个湖南谘议局议员黄翼球、常治带了军队去巡抚衙门，余诚格小衣小帽出来，他们劝他反正，他不肯，说，“此事重大，当